DOI:10.16813/j.cnki.cn35-1286/g4.2014.03.004

标准语·方言·文字

壮族古文字的研究价值与待解谜团

王元鹿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摘要:壮族的古文字至少有古壮字、坡芽歌书、甘桑石刻文字三种。古壮字字数敏多,其研究对汉字传播史、自源字与借源字的关系、拼盘文字的发生等研究有重大意义;坡芽歌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文字的基本面貌;甘桑石刻文字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研究将丰富我们对壮族古文字及壮族先民的了解。这些研究的继续,会为我们解决方块古壮文的发生年代、古壮文与花山崖刻的关系、古壮文与水族文字的关系、坡芽歌书的发生、甘桑石刻文字的文字性质等问题创造条件。

关键词:方块古壮文;坡芽歌书;甘桑石刻;文字发生;拼盘文字

中图分类号: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629(2014)03-0019-04

一、壮族古文字的研究价值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仅凭这一点,她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就不容怀疑。壮族分布于我国多个省市,这一情况也使其历史更加复杂、文化更加丰富。尤其是壮族的文字,更是种类繁多而内容丰富。方块古壮文是我国字数最多的民族古文字之一,坡芽歌书是我国最具早期文字性质的一种文字,而甘桑石刻符号则是我国近年新见于报刊的壮族居地的石刻。凡此种种,都说明壮族文字在文字学研究方面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值得我们用力研究。

其实,笔者与壮族古文字的因缘,可以归到十几年前。我们早在20世纪后期就开始编写一部收有包括古壮文在内的多种民族文字单字的工具书。在21世纪之初,我们开始建设一个含方块古壮字在内的网上数据库。其中古壮文数据库共收录了13 401个字形。在该数据库中,我们不仅对每个单字进行了性质分析,我们还利用图片处理软件、字体提取软件以及字体设计软件生成了古壮文字体,实现了方块古壮字的信息化检索。此外,坡芽歌书的网上数据库亦已建成。近年来,我的博士研究生袁香琴女士对此数据库进行了精心修订补充,使之变得更加完善。此外,我还与朱建军副教授合作发表过两篇关于富宁坡芽歌书的论文。[1]

本文将介绍壮族几种古文字研究的价值,并进而对有关壮族古文字的若干有待解决的课题作一些试探性的研究。

壮族不仅有方块壮文,还有两种古文字,这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

收稿日期:2014-3-13

作者简介:王元鹿,男,江苏苏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古文字。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字研究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12AZD119)、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早期文字资料库与《中华民族早期文字同义字典》(11JJD740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10BYY049)、上海市重点学科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B403)。

分而言之,这三种不同的壮族文字,互不相同而各有其特色,也各有其文字学理论上的认识价值。这些价值可分述于下:

壮族古文字的学术上的价值,至少可以分析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方块古壮文的字数,至少有一万多,足见方块古壮字的内容之宏富。就现在我们对另一种重要的民族古文字——纳西东巴文字的字数统计来看,也在万字左右。所以可以认为,古壮字在我国的民族古文字中是字数最多的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字学研究以及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素材。

其二,方块古壮字的主体是由于汉字传播而造成的,因此,据方块古壮字的研究,反推汉字的历史状况及传播过程与传播途径,必有很大的收获与启发。

其三,部分方块古壮字是壮族人民自造的符号,字数有限但在文献中也得到使用,虽然字频甚低,却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据袁香琴的统计,这种自造符号字数为62字[1],而使用频率甚低。袁香琴还分析了这类字使用频率甚小的原因,颇有合理性。但是为什么字量与字频如此之小的自造符号在壮文文献中却迄今未曾消失,这却是令人不得其解的问题。笔者相信,这一问题的解决,必有助于壮文发生与发展历史研究的深化。

其四,如上所述,方块古壮字是一种由壮族先民自造符号与流入后经壮族人民改造而形成的所谓"拼盘文字",即一种在发生学角度上看有不只一个来源的文字。方块古壮文既有本民族的自造字又有来自汉字的借源字,而且借源字字数愈万,自源字字数虽少也在60字以上,可见方块古壮字的材料对于迄今研究不足的拼盘文字的发生学研究极有材料价值。

其五,依据袁香琴的研究,方块古壮文中的自源字与借源字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联系。[2]也就是说,这一文字系统中的来源不同的两类字在古壮文形成之后有互相影响、互相拼合的现象存在。

其六,近年新发现的云南省富宁县壮族人民创造的坡芽歌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系统。我们判定,这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初始的早期文字"。坡芽歌书的研究价值至少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刚刚处于发生阶段上的文字,其面貌与状态是什么样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创制时间离现在不远,故籍此追溯文字发生及其早期风貌自然有较其他古文字方便之处。

其七,近年刊布的平果县甘桑出土的石刻符号,现在虽刚开始进行研究,但是其意义是可以预见的。这批符号的古远年代、较多的形体、与古汉字貌似相近却非同一系统的事实,似乎在告诉我们,依据已经刊布的材料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不易破读的文字。这是由于,此种文字的形态虽有与汉古文字近似的,却多与甲金文的字形基本不同者。一旦破读,会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比方块古壮字更加古远的文字系统以及这种文字的创造者生活时代的种种细节,乃至这些人与汉族先民的关系。袁香琴女士已对甘桑符号有一定的研究与思考,期待她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二、壮族文字研究的一些谜团

在壮族古文字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壮族文字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学海无涯,壮文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打破一切谜团的境界。打破这种种未解之谜,乃是我们今后的重大任务。壮族文字的几个谜团主要有:

第一,方块古壮文的发生年代究竟在何时?

文字学的难题往往多在发生学,而文字发生学的难题往往多在年代问题。方块古壮文的发生时间也是至今尚无定论。从文献资料看,在公元700年之前,已经有了主要以借源字构成的古代方块壮文。但是仅以借源字构成的古壮文,显然比这些已经成文的文献更早,此是我们未知的问题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方块古壮字作为一种拼盘文字,发生的年代问题就更加复杂。如果只是有借源字,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方块古壮字。方块古壮文的自源字发生于何时,是必须回答的一个

问题。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的答案。一种可能是:自源字晚于借源字的发生而发生,那么很可能自源字一产生就是借源字的附属与补充;另一种可能是:在借源字存在之时,壮族另有一个自源字系统,而到后来两类文字才得以合并,成为大致与今天一致的方块古壮字系统。在缺乏充分的资料及足够的推理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哪一种可能性是历史事实。

第二,方块古壮字与花山崖刻的关系如何?

有人猜测方块古壮字来自花山崖画。我们以为,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也仅仅是在排斥汉字借源字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即便如此,这一说法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此外,即便是讨论自源字的发生,那么,需注意自源字的源头也未必只有崖画一个。比如壮族本来有刻木和结绳记事,清代名医何梦瑶在路经壮族聚居地时,写了一首竹枝词记录壮族的契刻和结绳的风俗,有"从来不解官文字,木刻犹能拟结绳"之句,其实,木刻与结绳恰恰是文字的两个来源。所以,我们以为,方块古壮字的源头,即便其自造字的源头,也很可能是多元的,须要继续调查研究。

第三,与壮族邻近的水族文字同方块古壮字之间在发生学上有什么关系?这两种文字在各自形成之后有什么接触中的互相影响?

其实,从发生学角度而言,把方块古壮字与水文进行初步的宏观的比较,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在类型学上的相似点。因为至少二者都是含汉字在内的拼盘文字。但是,若是进行两种文字的几个角度上的仔细比较,我们会认识到:这两种文字不大会存在发生学上的关联。第一是发生时间,方块古壮字比水族文字要晚得多。其次是文字用途,二者也全然不同。第三是文字形体的特征,可以说也有较明显的差异。方块古壮字的书体,借源字是对汉字书体的继承,而水书则借自汉字却往往故意地背离汉字。由自源字看,二者的差别也是很大。第四是构字原理,也有极大不同。方块古壮字的借源字中含有大量形声字,而水文的借源字则仅仅是汉字形体的照搬。仅仅上述一些重要的差异,已经可以使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二者无发生学上的关系,也不存在有过各自形成之后的互相影响。当然,这一直觉尚须得到更加有力的证明。

第四,"坡芽歌书"似乎与古壮字没有联系,那么为什么会在富宁这个地方独立发生这种早期文字?一种文字的发生往往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那么此种文字的发生背景是什么?

壮族是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分布幅员广阔的民族,因此,在这个民族居住的多个地方发生几种文字是完全可能的。如纳西族的人口仅仅30来万,她存在一族四文的现象既然不足为怪,那么,如果壮族有三种文字更是十分正常的。而从文字的来源、形态与结构来看,坡芽歌书与方块古壮字也决不会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坡芽歌书是一种属于初始阶段的早期文字。应该说,一种文字的发生的原因与动因是多种多样的。尽管文字是文明的象征,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有文字的地方和人群就比没有文字的地方和人群一定具有更高的文化与文明水平。尤其是云南富宁地方,远离壮族聚居的中心,在不使用方块古壮字的情况下,他们自创另一种早期文字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种文字发生的背景是:他们的民歌有得到记录的需要,而且他们还有物件记事的习俗。具体地说,民歌的记录提供了对文字的需要,而物件记事提供了文字的造字理据。然而,任何一种文字的存在都有其复杂的原因,因此,对坡芽歌书的发生原因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第五,甘桑石刻符号是不是一种拼盘文字?其来源是什么?

依据已经刊布的甘桑石刻符号看,如果它是一种文字,则它很可能是一种拼盘文字。因为其部分符号的结构与体态与早期的汉古文字有若干相似点,又有若干不同点,有更多的符号似属于壮族先民自造。在确认它是一个文字系统之前,我们似乎还不急于讨论其作为一种文字的来源与性质。

在壮族与汉族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尽管壮

族文字谜团不少，我们的研究将任重而道远，这种种谜团还是可以一一得到解决。而这些谜团的解决，也必然会有助于促进对壮族古文字的其他方面谜团的进一步解决，并促进普通文字学与文字学理论的研究。

注释：

①王元鹿、朱建军《"坡芽歌书"的性质及其在文字学领域中的认识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朱建军、王元鹿《坡芽文字的结构及其在文字史上所处的阶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袁香琴.方块古壮字非纯借源字的重新审视[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袁香琴.方块古壮字与水文拼合字的比较研究[J].理论月刊，2014(1).

〔责任编辑：林清书〕

Some Puzzles of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s and Their Research Values

WANG Yuanlu

Abstrac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kinds of characters handed down in Zhuang nationality. such as ancient characters of Zhuang, Poya folk Songs and Gan Sang stone inscriptio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s has great significance on his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spread,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souree and borrow-source words and the germination of mixed characters. The study of Poya Folk Songs help us to undestand the basic features of early writing systems. The study of Gan Sang stone inscription which is in early stage can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s and ancestors of Zhuang nationality. All the studies will cerate conditions for solve problems as germination age of ancient characters of Zhuang, the relationship of ancient characters of Zhuang and Shan stone inscrip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ancient characters of Zhuang and the ancient charaters of Sui People, the germination of Folk Songs, the properties of Gan Sang stone inscription.

Key words: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s; Po Ya Song Book; Gan Sang carvings; character occurrence; assorted characters

（上接第18页）

History of Academy Culture in Peitian and Its Reserve

WU Wei

Abstract: There existed more than 10 academies in Peitian villag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formed a locally characteristic culture of academy. These academies were constructed in different forms, being the local and colorful cultural views. More importantly, these academie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educating local people and forming cultural tradition in Peitian. In the meantime, the academies also witnessed the rise-and-fall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transforming procedure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into modern one. In recent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Peitian, the ways for virtuous circle of academy reserve in Peitian should be urgently discovered. The introduction of biological museum pattern is one of these helpful solutions.

Key words: Peitian; academy culture; museum of biology

王元鹿教授

王元鹿，男，生于1946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研究员兼民族文字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字学会会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国际纳西文化学会常务理事、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西语文学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字学、普通文字学、中国民族文字与古文字学。

主要专著有《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1988)、《普通文字学概论》(1996)与《比较文字学》(2001)。这三部专著分别是我国关于两种文字比较研究的第一部通论性专著、关于普通文字学的第一部通论性专著与关于比较文字学的第一部通论性专著。《比较文字学》(2001)被教育部认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所发表论文分别以汉、东巴、哥巴、玛丽玛莎、达巴、尔苏沙巴、水、壮及北美印第安等民族古文字为研究主题。另有《中国文字家族》、《汉字中的符号之美》等专著及论文集《王元鹿普通文字学与比较文字学论集》。主编丛书《看懂中国字·读懂中国心》。

工具书《古文字诂林》(1999—2004)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集体，任作者兼常务编委)，论文《北美印第安文字对文字源泉研究的启发意义》(1995)、《由若喀字与鲁甸字看纳西东巴文字流播中的发展》(2001)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论文《表词—意音文字记录语言方式的比较——兼论汉字的某些特殊性格》(1999)、《玛丽玛莎文字源与结构考》(2004)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专著《比较文字学》(2001)获上海市教育成果奖。曾获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正在主持执行的项目有"'世界记忆遗产'东巴文字研究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汉字与南方民族古文字关系研究"(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中华民族早期文字资料库与《中华民族早期文字同义对照字典》"(教育部重大项目)；已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课题"比较文字学"、教育部重大课题"古汉字与其他民族古文字同义比较研究"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汉字发生研究"、"中华民族古文字资料库与电子字典"。